

敦煌莫高窟
(劉詩平 攝)



莫高窟與大泉河
(劉詩平 攝)



莫高窟第 45 窟彩塑，2020 年中國郵政發行的「莫高窟」小型張。



段文杰臨摹都督夫人禮佛圖
(劉詩平攝於 2021 年「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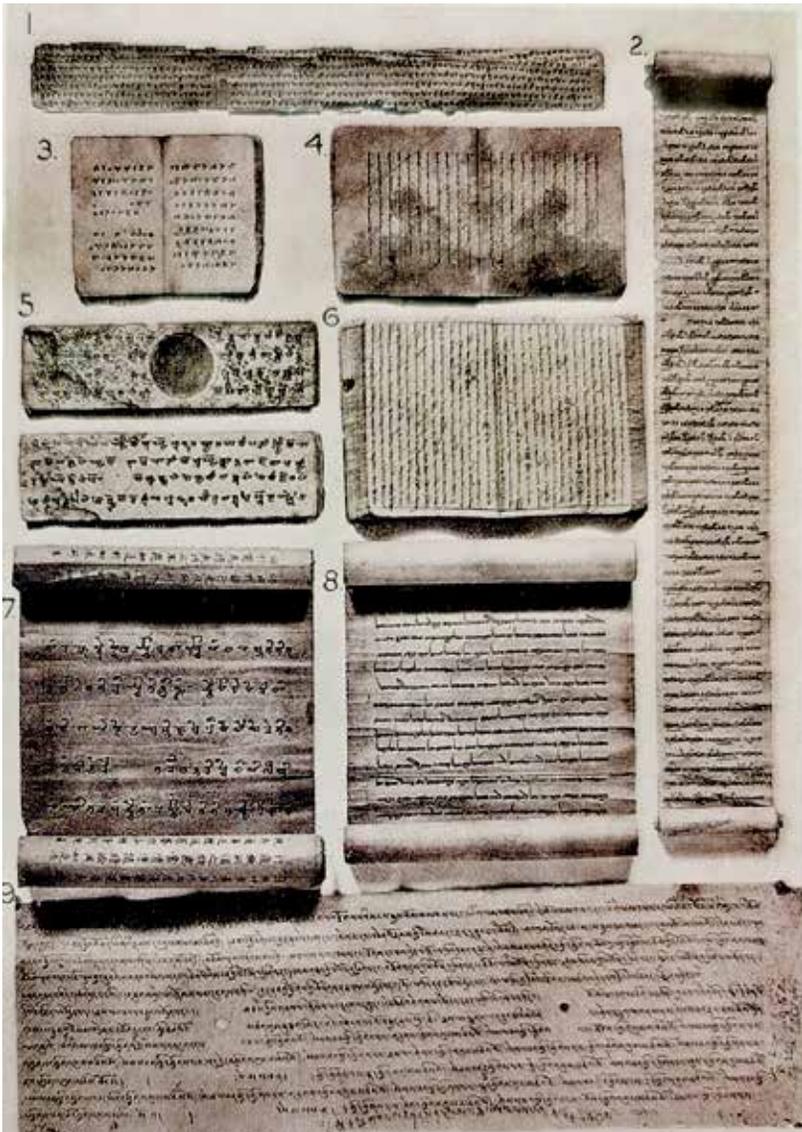
20 世紀 50 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專業人員在油燈下臨摹壁畫。
(劉詩平攝於 2021 年「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



斯坦因所攝藏經洞經卷的較原始狀態
(圖片來源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斯坦因挑選出來的漢文寫本
 (圖片來源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斯坦因挑選出來的非漢文寫本
(圖片來源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敦煌夢尋

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

敦煌夢尋

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

劉詩平、孟憲實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增訂版序言 尋夢敦煌	001
第一版序言 寫在前面	004
序 篇 新世紀來臨	005
第一編 傷心敦煌	009
第1章 小人物的大發現	011
第2章 斯坦因的中國護照	026
第3章 伯希和洞中挑寶	048
第4章 難言之痛：從敦煌到北京	062
第5章 大谷收集品的悲劇	068
第6章 勒柯克的終生遺憾	078
第7章 俄國人的神秘之旅	090
第8章 陷入困境的華爾納	098
第9章 斯坦因的最後出場	119
第10章 不是尾聲：王道士之死	135
第二編 四海尋夢	145
第11章 漫漫西天取經路	147
第12章 敦煌學的東洋旋風	165
第13章 敦煌劫餘傷心史	182
第14章 歐洲尋夢之旅	189
第15章 西北考察之變	202

第 16 章	藝術家的激情歲月	216
第 17 章	政治家的人文情懷	225
第 18 章	攝影家的敦煌留影	234
第 19 章	學者的冷暖敦煌	242
第 20 章	鐵馬叮嚀：敦煌守護神	255

第三編 魂兮歸來 267

第 21 章	新時代的國寶之光	269
第 22 章	幽暗歲月的花果飄零	282
第 23 章	港台學者的學術報國	292
第 24 章	敦煌學的東洋第三波	303
第 25 章	大師相傳的法國敦煌學	309
第 26 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319
第 27 章	中國敦煌學的崛起	330
第 28 章	藏經洞的百年檢閱	350
第 29 章	世界目光下的敦煌	361
第 30 章	魂歸故土，重光於世	377

尾 篇 人類的敦煌 391

主要參考文獻	399
第一版後記 回憶與感謝（劉詩平）	409
增訂版後記 永遠的敦煌（劉詩平）	412

尋夢敦煌

在敦煌發現世界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里，敦煌的世界性無與倫比。

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前，沒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絲綢之路更聯通世界。在東西方大國起起落落之間，在各種物質交換和精神交流之間，數不清的商旅、僧侶、盜匪、軍隊、外交使團活躍在這條國際通道上。

敦煌，地處絲路繁華、扼守絲路要衝，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人們生活和流動在這裡。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在這裡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這裡匯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遺書，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連綿相延的歷史，保留在幸存的 735 個洞窟、2400 多身彩塑、45000 多平方米壁畫中，保存在 6 萬多件用漢文、藏文、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等文字書寫的寫本和繪畫作品中。

如果說藏經洞是一個儲存着歷史記憶的圖書館，那麼莫高窟就是一個陳列着古代藝術的博物館。作為地球上保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藝術遺存，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無可置疑地顯示了它的珍貴和獨一無二。

在世界尋找敦煌

在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陳列着一部由中國人在公元 868 年印製的《金剛經》，這部長約 5 米、反映當地民眾宗教信仰的佛經，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本。它來自敦煌藏經洞，斯坦因把它帶到了這裡。

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着中國現存最早的圖經之一——沙州都督府圖經。與這部唐代圖經一道收藏於此的，還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內容的差科簿，記錄了敦煌縣從化鄉約 300 個家庭的生活點滴，絕大部分是高度漢化了的粟特人——一個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極其善於國際貿易的民族。它們均來自敦煌藏經洞，伯希和把它們帶到了這裡。

在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塑供養菩薩像。這個出自唐朝藝術家之手的菩薩像，體態修長，瓔珞長垂，氣質端莊典雅，造型嚴謹流暢，已成為博物館「鎮館之寶」。它來自敦煌莫高窟，華爾納把它搬來了這裡。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有一幅公元 8 世紀的《觀無量壽經變》殘絹畫，畫上的一組菩薩像和四個頭戴「垂腳蹠頭」的男性供養人，生動地反映了唐朝人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樣來自敦煌莫高窟，奧登堡把它帶到了這裡。

敦煌遺書和石窟壁畫及雕塑分藏於世界各地。當年，它們的流散過程，充滿了無知與欺騙、巧取與豪奪。今天，各國收藏機構合作對其修復、出版與數字共享，各國學者悉心研究和相互交流，共同推進對人類文明成果的保護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遺書和石窟藝術為核心內容的敦煌學，從一開始就展現了它的世界性，並在不同國家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敦煌學家。從日本關東到關西，從巴黎到倫敦，從聖彼得堡到美國東西海岸，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敦煌，追索歷史、啟迪未來。

敦煌夢尋

1900 年藏經洞豁然洞開，許多人的命運開始與敦煌緊密相連。他們逐夢敦煌，有的人美夢成真，有的人噩夢相連。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為他在莫高窟弘揚道教的夢想，洞開了新的大門。斯坦因、伯希和萬里遠征，實現了獲取敦煌寶藏的夢想，也讓藏經洞成為了中國人的傷痛記憶。勒柯克在拋硬幣決定命運時與敦煌寶藏失之交臂，華爾納準備揭走敦煌整窟壁畫時大敗而歸，他們夢想的破滅，是敦煌寶藏幸運的獲救。

敦煌遺書的命運，折射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藏經洞遺書已經流散，民族尊嚴與學術的希望不能失去。從向達、王重民到榮新江、王冀青，為了追尋流散在異國他鄉的國寶，一代代學者接力，走上了崎嶇漫長的尋夢之路。尋找敦煌寶藏，也是在尋找民族之魂，尋找文化之本。

與此同時，一批批藝術家和學者懷抱敦煌夢，來到莫高窟。常書鴻在祖國多難之際從巴黎回國，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敦煌，從此成為一生的守候。段文杰從 1946 年到達莫高窟後，每天聽着九層樓上的鐵馬叮噠聲，再也沒有離開。樊錦詩，這位「敦煌的女兒」，年過八旬依然心中有夢。她說：「我白天想敦煌，晚上夢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

走進敦煌

2000 年敦煌藏經洞發現 100 周年之際，我們撰寫了《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通過數年的努力，試着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一段難忘的心靈歷程。

如今，我們將書名改定為《敦煌夢尋：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同時圍繞四個方面對全書展開修訂：一是吸收和融入 20 年來全世界敦煌文獻公佈、敦煌學研究進展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藝術及其研究者的內容，使敦煌學兩大核心——敦煌石室遺書和敦煌石窟藝術及其研究者的故事盡可能較均衡呈現；三是增加近年來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內容，由此不難看到一百多年來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相互關係發生的變化；四是豐富圖片內容，盡可能讓圖片與文字互補，相得益彰。

讓我們走進敦煌，這裡有曲折的歷史和多樣的文化，有廣闊的世界和遼闊的人生。

寫在前面

當 20 世紀剛剛揭開序幕時，在中國的西北一角，一扇歷史之門被一個小人物打開。沒有人能夠想到：一段長長的歷史，會被古人封存在一個小小的密室之中。這個密室，就是敦煌藏經洞。人們無法估量它的密藏的價值，於是籠統地稱之為國寶、珍寶、寶藏……

藏經洞珍品的流散，是近代中國傷心歷程的縮影。傷心不僅僅在於國寶外流的本身，還在於國人的愚昧和麻木。20 世紀初期，中國的歷史與未來被現實的重重迷霧遮蔽，人們只能從瀰漫的濃霧中聽到一些斷續的呼喚。但是，這個聲音的確是漸漸增強了。

幾代學人的嘔心瀝血，難道僅僅只是為了追尋國寶嗎？民族的尊嚴和信心，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決心，不過是為着有一天，子孫不再抱恨和傷心。尋夢之路，崎嶇漫長，外人的歧視和國人的無知，增添的不僅僅是悲壯的氣氛。當魂兮歸來之日，陰霾散去，國人的心胸也隨之豁然開朗起來。

這裡講述的，都是真實的故事。為了解每一個具體細節，作者花費了多年的心血進行文獻調查和人物訪問。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說明的卻是很簡單的常識。作者本來只想告訴讀者一些事實，結果卻被書中的故事打動，欲辯已忘言了。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謹以此書獻給為了敦煌事業，為了民族精神而奮鬥不息的人們。

序 篇

新世紀來臨

1900年初夏的北京，朝野動盪，人心惶惶。

中國在一種很難描述的情境中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當中國內部的改革力量被反對勢力鎮壓之後，清朝政府在政治上已經進退維谷。民間排外勢力以義和團的形式像山火一樣在中國大地上蔓延。西方列強蠢蠢欲動，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仍在舉棋不定。

5月28日，列強正式決定聯合出兵中國，並且很快採取了軍事行動。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組成聯軍，統一對中國作戰。

一個謠言——或許是主戰派的一個陰謀，終於促使慈禧太后選擇了戰爭。據說外國人想通過戰爭迫使慈禧還政於光緒，而這無疑是「戊戌政變」後慈禧最為擔心的。6月21日，慈禧發佈宣戰諭旨：對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諭旨的內容是鏗鏘有力的，也許折射出了部分國人的民族情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實際上，清廷當時與列強戰爭的本錢，除了民間的反帝情緒之外，一無所有。義和團的神助之說，無異於癡人說夢。各地的領兵將領和封疆大吏早就在各自盤算，各行其是。一場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荒唐戰爭就這樣開始了，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眾多的特殊表象之一。

清廷雖然宣戰，但並沒有統一的作戰部署，宛如在進行一場規則不清的戰爭遊戲。比如，不該發生戰事的北京使館區，當時竟然是一個重要戰場。

攻打法國使館的指揮官之一，是神機營總兵輔國公載瀾。法國使館是法國人在北京的大本營，躲避義和團的法國人聚集於此。參加保衛戰的人群中，一個年輕人表現神勇，他在一次近身戰中，竟然奪得了義和團的一面旗幟。此事，在使館裡的許多人看來的確是過於冒險了，但他自己卻理所當然地以勇敢自居。這個法國人的名字叫伯希和。

緊挨着法國使館的日本使館也同樣發生了戰鬥。兩個日本留學生驚慌失措地躲進了本國使館，其中之一來自東京大學，他才剛剛到達北京。由於使館警衛尚不到二十人，因此他來得正是時候，可以派上用場。當使館之圍獲解後，這位留學生急匆匆返回了日本。他的名字叫狩野直喜。

……

中國在抗擊着八國聯軍，但是混亂的局面，讓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場由國家組織的戰爭。在中國更廣闊的地方，生活與往日沒有甚麼不同。首都使館區展開的戰爭，就像發生在別國的土地上一樣。

十里洋場的上海，依然沉浸在與北京完全不同的夢境中，這裡很少發生激烈的排外事件。一位熱衷於政治的學者，這時正在大力推動他的新式農學。他就是學農社、農報館和東文學社的創辦人羅振玉。

在遙遠的西部，一個由駱駝和馬匹組成的探險隊正在趕往中國。領隊是位雄心勃勃但國籍不清的人。無數珍貴的古代文物正在等待着他，對此他信心十足，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他就是斯坦因。

……

中國以外的世界，人們正在滿懷企望地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在東京，又一艘海輪乘風遠航，夏日的太平洋波光粼粼。海輪上有一位前往倫敦留學的年輕僧人，他關心佛教的歷史，也關心西方在中亞的探險，更關心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他的名字叫大谷光瑞。

在柏林，一位 40 歲的學生正在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他對發生在北京的戰爭不感興趣，就如同對待自己家裡祖傳的商業一樣，他的物慾似乎只表現在東方的古代文物上。他的名字叫勒柯克。

這一年，西方國家正在認真地考慮俄國人在上一年提出的建議，成立「中亞和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俗學國際考察協會」（國際中亞探險協會），俄國的一位學者隨後成了這個分享東方文物的協會主席。他的名字叫奧登堡。

……

6 月 22 日，是清朝當局向列強發佈戰爭宣言的第二天。八國聯軍在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統率下，正從天津向北京進發。

6 月 22 日，王道士如同往日一樣忙碌着，在龐大的莫高窟石窟群前，他那單薄的身影顯得有些過於矮小。

……

20 世紀就這樣開始了。

大眾仍然生活在自己狹窄的天地裡，世界依然廣闊無垠。但是，科技和交往正在把地球變小，把人們拉近。雜亂無章的世界背後，真的可以有一條連貫的線索。中國與世界，中國的學者與各國的學者，都在忙於自己重視的事情。沒有人想起遙遠荒涼的莫高窟，更沒有誰想去結識人單影隻的王道士。本來人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會改變這一切。毫無關係的眾多人和事，會突然改變自己的航道，緊密地相互連接起來。

王道士 6 月 22 日的忙碌，於是有了世界性的意義。



第一編

傷心敦煌

王道士的偶然發現，石室秘寶重見天日。當一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政府連首都也即將為列強攻陷，當千年寶藏長期掌握在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道士手中，這樣的一個背景本身，也許已經暗含着一種命運。在政府和社會上下對寶藏或熟視無睹、或麻木不仁，以致聽其流散時，英、法、日、俄、美等列強的考察家們先後聞聲趕到，本國政府的各級官員也紛紛出馬。石室秘寶從此無處藏身，奪寶、藏寶、運寶由此展開。藏經洞，成了一個民族滴血的傷口。

第 1 章 小人物的大發現

石室密寶：藏經洞的發現

傳奇往往是在不經意中完成的。

王道士在 1900 年 6 月 22 日的忙碌，不過是他很日常的工作。在莫高窟建立道教的太清宮，重修三層樓，將後來編號為 16 號窟和它上方的 365 窟、366 窟建成標誌性的場所，是王道士到達這裡後弘揚道教的重點工程。他需要治理流沙、整治洞窟、裝飾牆壁、翻新塑像。他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到處化緣，省吃儉用，積攢足夠的錢，以完成自己的宏願。今天的工作依然是把 16 號這個底層洞窟中的積沙清理出去，否則甚麼工程也無法進行。

積沙在這裡日積月累了數百年，要徹底清除出去談何容易！但王道士畢竟是有信仰的人，這點困難算不了甚麼。積沙實在太多，持續一年多的清沙工程，在他和他所雇請的人的努力下，到今天總算告一段落了。

王道士欣慰地向 16 號窟外面走去，這時甬道左邊畫滿壁畫的牆壁裂出了一條縫隙。在王道士的印象中，這個洞窟的這側牆應該是山體，不應該是虛空的，怎麼會有縫隙呢？王道士一定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他滿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牆壁，竟然有空洞的聲音傳出。沿着牆的縫隙，他掘開了一個洞。

原來別有洞天。在不到 8 平方米的洞內，紙寫經卷堆積如山，而且排列整齊。從日後的調查所知，洞內堆滿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古老文書，除了極少量的雕版印刷品，絕大多數都是手寫本。文字以漢文為主，也不乏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內容包羅萬象，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書為主，也廣泛涉及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醫學、數學等。常言道：插架森森多於筍，世人何曾見唐本。眼前，卻是一洞子的珍本秘籍。

王道士驚呆了。他所面對的，正是震驚世界的敦煌藏經洞。

20 世紀的世界文化史，都要有這樣的文字記載：王道士發現了敦煌藏經洞。

王道士：一個模糊的身影

王道士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即使追溯他一生的事跡，也看不出他與他的偉大發現有甚麼必然性的聯繫。



王道士（斯坦因攝於1907年）

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現在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叫圓籙，「圓籙」原作「元籙」，這個名字的道教味兒是如此濃厚，讓人感覺到這一定是在他成了道士之後才有了的像樣的名字。在留存至今的文獻中，王道士的名字也寫成王圓祿、王圓錄，信教後的正式法號叫做「法真」。

就在王道士還是童年的時候，麻城發生了嚴重的災荒。咸豐六年（1857年），湖北省包括麻城在內的十個大縣從農曆六月到九月罕見大旱。第二年，繼續大旱，而且由此引發了嚴重的蝗災。災區既廣，災情且重。史書記載「禾麥盡槁，斗米千錢，人有菜色，野有飢殍」。政府雖有「緩徵本年租稅三分之二」的政策，但對

於一些受災農民來說，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它們只能選擇背井離鄉。

在逃難的人群中，有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他就是後來的王道士。從這時起，開始了他漫長的流浪生涯。沒有人會去注意一個流浪兒的生活，所以即使後來王道士發現了舉世矚目的敦煌藏經洞，他的早期人生經歷也仍然是不清晰的。比如我們至今不知道他接受了怎樣的教育，因為他確實是粗通文字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在流浪過程中有過怎樣的遭遇，因為流浪生活畢竟是苦難的漂流。後來他在甘肅酒泉的巡防軍裡當差，具體情況依然不清楚。

王道士好像是在酒泉退伍後就地披髮為道的，他的師傅是盛道法師。從八九歲逃荒離鄉，到年近半百出家為道，王道士的墓誌銘說他「歷盡魔劫」，從而「灰心名利」。再後來王道士又開始四處漂泊，用宗教語言說叫「遊方」。不過，這時的王道士與普通的流浪者不同，在他的心中已經種下了宗教的信仰。他到過許多地方，最後在敦煌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天地。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的勝地，歷史上的輝煌雖然已成過往，但荒蕪的洞窟和斑駁的造像，仍然散發着雄渾的氣魄和誘人的光彩。莫高窟濃厚的宗教氛圍，一定是導致王道士決定停下他那雲遊腳步的重要原因。

王道士選擇了莫高窟，莫高窟接納了王道士。

王道士落腳莫高窟時，莫高窟南區的上寺和中寺，住着兩個藏傳佛教的喇嘛，他於是在南區北端的下寺住了下來。下寺並無地面建築，因此現在編號為344窟的洞窟成了他的棲身之所。後來，他曾經將此窟作為做法事的地方，而另將342窟改為住室。

由道士打理破敗了的佛教石窟寺，這種看似「鵲佔鳩巢」的行為，在清朝光緒年間的河西一帶道教重新振作時並不少見。不僅莫高窟如此，被稱為「萬佛峽」的榆林窟、肅州文殊山石窟寺等等，此時也同樣為道士所「看護」。

王道士有一系列的計劃，在藏經洞發現之前，他已經採取了許多行動。他外出化緣有一些收入，在莫高窟接待禮佛的人群也有一些回報。在莫高窟的一些洞窟裡，已經擺放着由他新塑的泥像和經他之手塗抹的新「壁畫」。他在莫高窟前栽種了一片白楊，如今早已參天蔽日。

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了下來，使他終於成了藏經洞的揭秘人。神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虔誠的宗教信仰應該是他接近藏經洞的關鍵所在，如果王道士沒有在莫高窟發展道教的志向，藏經洞不知道何時會被發現。

敦煌：蒙塵的絲路明珠

在王道士到達莫高窟的時候，敦煌是一個邊塞僻遠的小縣。縣裡的人多為文盲，參加會考的生員一年不過三五人。王道士當然不知道，這個寂寞不堪的小縣，歷史上曾經是個熙熙攘攘的國際化城市。不同的年代，大街上能聽到人們用漢語、藏語、粟特語、于闐語、吐火羅語、回鶻語等國內外十多種語言說話的聲音。

破敗的敦煌，沒落的帝國。眼前蕭索落寞，昔日輝煌記憶如煙。

2200多年前，即公元前3世紀後半期，中亞以東由北而南依次是三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匈奴、大月氏和秦漢帝國。互相角逐的結果，各股力量像走馬燈一樣在敦煌、新疆一帶更替。首先是位居敦煌、祁連間的大月氏勢力強大，雄居蒙古高原的匈奴雖然以強悍著稱，仍舊得把匈奴王的兒子送到大月氏押作人質。秦漢之際，匈奴強盛起來，將大月氏排擠到了西域北部，進而逼向更西的地方。同時，與建立起統一的秦帝國展開較量，漢初更迫使為求得外部和平以鞏固內政的漢王朝實施「和親」政策，把皇室的公主送給匈奴王為妻。在廣闊的西域，匈奴實現了稱霸的野心。

經過一個甲子的休養生息，日漸強盛的漢帝國無法再忍受匈奴的盛氣凌人，

決定傾國一戰。不過，考慮到實力問題，漢帝國決定與匈奴的世仇大月氏聯合，「斷匈奴右臂」，希望因此戰勝匈奴。公元前 138 年，漢武帝作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斷——派張騫西使大月氏。

張騫經匈奴、大宛、康居等國，出生入死，最後來到了中亞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所在地。時過境遷，大月氏已經滿足於現狀，張騫聯合大月氏的願望落空，但是他帶回的情報，讓漢武帝知道了西域的重要，以及匈奴控制這一地區的嚴重後果。於是，漢武帝果斷下令：出兵河西。

霍去病將軍率領部隊越過祁連山，二度進軍河西，將河西併入漢帝國版圖。隨後，漢武帝陸續在此設立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同時把長城修築到了敦煌以西，並在敦煌城西設立玉門關和陽關，作為扼守西域進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門。四郡的存在，既是漢帝國進軍中亞的軍事據點，也是東西交通的樞紐和各民族間友好交流的中心。

張騫「鑿空」——開闢通往西天之路——在世界歷史上打通了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開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紀元。

漢代絲綢之路，從都城長安出發，沿河西走廊西行，到達敦煌。由敦煌西出陽關，沿崑崙山北麓，經鄯善、于闐到莎車，越蔥嶺（帕米爾高原），進入大月氏、安息（波斯）等國，此為南道。由敦煌西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經車師前王庭（吐魯番）、龜茲（庫車），越蔥嶺，進入大宛、康居等國，此為北道。

絲綢之路既是一條物化的金銀財寶之路，也是一條精神的文化傳播之路。絲路上活躍着一批又一批的國際商隊，行走着一個又一個的宗教僧侶。位於絲路幹線上的敦煌，漸漸成了東西方商品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一顆明珠。

隋唐時代，絲綢之路向東經河西走廊通向長安、洛陽並延伸至朝鮮和日本，向西在新疆境內擴展，分別通往東羅馬、波斯和印度，而「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敦煌，隨着唐帝國的興盛迎來了新的繁榮。當時國際上的最大中間貿易商——粟特商人，有的在賺取錢財後歸化唐朝，敦煌縣「歸化鄉」住的便主要是粟特人。作為國際移民城市的敦煌，不同民族群相混居，不同語言交互使用，不同文字普遍流行，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和波斯文明在這裡相互激蕩，交相輝映。歷史學家為我們找到了一千多年前學校裡當作課本用的儒家經典，當地人信奉的道教寺廟——「神泉觀」，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拜火教）神祠。藏經洞裡出土的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寫本，同樣透露着它們在這裡傳播的信息。至於

佛教的流行，日本學者乾脆稱敦煌為「佛教都會」。

755年，安祿山發起叛亂，河西一帶的唐朝軍隊調往中原。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國於是趁虛而入，敦煌淪陷，河西淪陷，西域淪陷。

吐蕃統治敦煌數十年後，當地人民在張議潮統率下起義，隨後遣使歸附唐朝。851年，唐朝遣使河西在敦煌設立歸義軍，以張議潮為首任節度使，從此開始了延續近200年的「歸義軍時代」。

1036年，西夏佔領敦煌。陸上絲路時斷時續之時，海上絲路蓬勃興起。元朝時期，北方的草原絲路開通，敦煌被棄置一旁。明朝以後，嘉峪關建起，敦煌更成為邊外荒涼之地。終元明清三代，敦煌變得遙遠且荒蕪，成了被歷史遺忘的一個小小角落。

敦煌，這顆耀眼的明珠，漸漸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土。

莫高窟：失去了輝煌的石窟群

歷史的選擇，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傳法師來到敦煌。在鳴沙山和三危山之間，黨河宕泉（大泉河）在夕陽的輝光中靜靜流淌。忽然，東邊的三危山頂現出奇異景象，只見金光萬道，猶如佛祖顯像。樂傳在驚呆之餘，相信這是佛祖對自己的啟示。於是，他立下誓言，在這裡開窟塑像，興建廟宇。現今敦煌市東南約25公里處的莫高窟，第一座佛窟就此誕生。

多年以後，法良禪師來到這裡，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後，修窟之舉，生生不息。到唐朝武則天時期，已有佛窟大大小小一千餘座。

莫高窟在鳴沙山的東側斷崖上，坐西向東，南北相延，洞窟分上下幾層不等，壁畫和雕塑分佈窟內。從十六國開始，歷經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朝等不同時代，歷經千年。如今，在1700多米長的斷崖上，依然保存有735個洞窟（包括南區和北區），壁畫45000多平方米，塑像2300多個，是世界上現存最為壯觀的佛教藝術寶庫。

過去，這裡是人們表達宗教信仰的場所。如今，這裡是我們觀賞古代藝術傑作的天然博物館。面對這些層疊交錯、連綿如蜂房的石窟群，我們不能不驚歎於古人的信仰與歷史的造化。如果按兩米的寬度展開，莫高窟的壁畫全長可以延展25公里，從莫高窟延至敦煌市。坐在時速25公里的汽車瀏覽，要整整一個小時才能把全部壁畫打一個照面。再加上2300多個塑像和各個時代的石窟建築，從

變化複雜的壁畫題材，從綿延相繼的歷史體系，從包羅萬象的宗教典釋，從演變無窮的藝術系統……置身其間，給人以驚心動魄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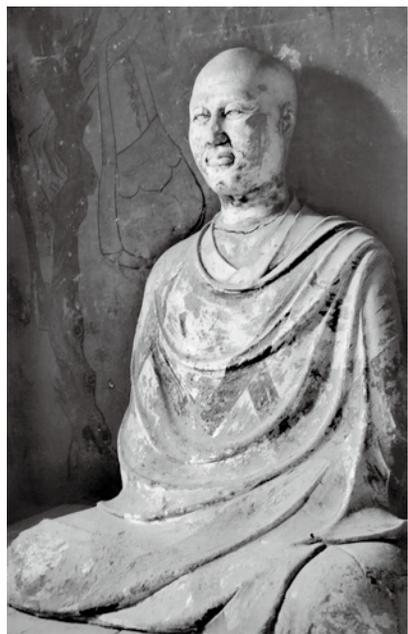
這顆躲過北周武帝、唐武宗等滅佛毀寺厄運而幸存的沙漠明珠，元明清逐漸遭到冷落。殘破荒涼的莫高窟除了附近居民小規模地拜佛以外，沒有修繕，也缺乏基本保護。王道士來到這裡的時候，只有兩個藏傳佛教喇嘛居此念經誦佛。

千年莫高窟，正在忍受着最後的寂寞。

如果沒有王道士對藏經洞的發現，莫高窟迎接全世界目光的日子，無疑會再拖後一些。

藏經洞：儲存着歷史記憶的圖書館

藏經洞不過是個方丈小室，面積不到 8 平方米，每壁邊長不足 3 米，高不足 2.5 米，覆斗形窟頂也只有 3 米高。北壁下方正中，是一個長方形禪床式的低壇。禪床上是一尊彩塑高僧坐像。僧人的禪床和僧像提示我們，這是在紀念一名地位顯赫的高僧。



洪晉塑像

洞窟西壁，北端有一碑龕，內嵌一通高 1.5 米、寬 0.7 米的石碑。碑文告訴我們，現在編號為第 17 窟的藏經洞，是為紀念一位 9 世紀名叫洪晉的高僧而開鑿的影窟。洪晉是吐蕃統治末期沙州（敦煌）佛教教團的首領，張議潮舉義時，洪晉在宗教和政治上起了不小的作用。對此，唐王朝褒獎有加。碑文記錄的，正是朝廷給洪晉的告身（任職書）、敕牒詔書和敕賜衣物錄本。朝廷封他為「京城內外臨壇大德、賜紫衣、充河西釋門都僧統攝沙州法律三學教主」。第 16 窟、17 窟即是他在 851—862 年任河西都僧統時所開鑿。

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前，這個密閉的洞窟入口處被泥磚封堵，泥磚上塗抹了一層灰泥，使得藏經洞口與主窟甬道北壁

渾然一體，再在此基礎上將整個牆壁繪上壁畫，因而一般情況下並不能發現牆壁之後，另有藏經洞的存在。

既然稱作「藏經洞」，當然是因為洞窟裡藏有眾多的經卷。所謂經卷，主要指佛教經典。不過，除佛經之外，也有內容涉及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的文書。這些文書，多數為印刷術發明之前的寫本，也有少量的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因此，人們把藏經洞發現的藏品，叫做敦煌經卷，或敦煌寫經、敦煌卷子、敦煌藏經、敦煌遺書、敦煌文書等等，因其珍貴也稱為「敦煌寶藏」。

這些文書的時間跨度從 5 世紀到 11 世紀，用漢文、藏文、回鶻文、粟特文、于闐文、突厥文、吐火羅文等文字書寫的經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約、戶籍、賬簿、變文、曲子詞等，數以萬計。

從某種程度上說，藏經洞珍藏着一部中古中國的百科全書。大批罕見的歷史資料和已經失傳的吐火羅文、于闐文等文書的出現，讓中國以及世界的許多歷史記憶再次復活，整個世界的興奮可想而知。

千古之謎：藏經洞的封閉

在佛教獨享尊榮的歸義軍時代，莫高窟前建起了一座規模不大的寺廟——三界寺。幾十年過去之後，洪晉的英雄事跡漸漸被人們淡忘。大概是這個小小的洞窟距離三界寺較近的緣故，10 世紀中葉，它成了三界寺道真和尚用來放置佛典、供養器具，以及收羅古壞經卷、修補佛典的儲藏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一直由道真管理着。

藏經洞藏品的主體是佛典和佛畫，它們原本是屬於三界寺的財產。但是我們看到，藏經洞裡發現的佛經，有些並不屬於三界寺，而是蓋着龍興寺、開元寺等寺院的藏書印。有些佛經寫本，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出自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抄經手。

原來，這些佛經是道真從敦煌各寺收集來的。吐蕃統治敦煌以來，各寺佛典普遍缺失。在那紙張值錢的年代，紙張稀缺的地方，即使是位於沙州（敦煌）州衙附近的本地最大官家寺院——龍興寺，其藏經和供養器具也同樣缺乏，破舊的幡畫、佛像和法器一用再用，更不用說遠離州城的小廟——三界寺了。

針對佛典缺失的現狀，道真採取了從各寺收集佛典抄本、修補集成的做法。因此，藏經洞所藏從 5 世紀初葉以來的各種佛教典籍，既有許多長達 10 米以

上、首尾完整的經卷和精美絕倫的佛畫，也有相當數量是從各寺收羅來的古壞經文和有待修補的殘經。

吐蕃對敦煌的統治在公元 848 年已經結束，但藏經洞中仍然有大量此後的藏文經卷。這又是為甚麼呢？吐蕃統治敦煌期間，極力扶持佛教。吐蕃時期的高僧法成，是對漢文、藏文佛典都極為精通的唯識宗大師，發動起義推翻吐蕃政權的張議潮曾經跟他念過經。吐蕃政權推翻後，法成繼續留在敦煌講經，他使用的藏文經典因此也繼續使用。

藏經洞裡有晚至 10 世紀的粟特語文獻，這是因為不僅絲綢之路上活躍着大量的粟特商人，更因為 8 世紀的唐朝敦煌，有過一個人數眾多的粟特人聚落。

藏經洞裡有大量的回鶻文、于闐文文獻，則是因為歸義軍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曹氏與佔據張掖的甘州回鶻和西邊的于闐王國都有着姻親關係。整個 10 世紀，敦煌與佔據吐魯番的西州回鶻、于闐王國和甘州回鶻之間往來頻繁，許多回鶻人和于闐人長期逗留敦煌，一些回鶻文、于闐文佛典以及其他文書正是出自他們的手筆。與此同時，歸義軍治下的僧俗民眾也不乏精通回鶻文和于闐文者。

洪誓和尚的紀念室，變成了道真和尚的儲藏所。道真和尚的儲藏所，又很快變成了被封閉的藏經洞。

于闐王國被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所滅，是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導火索。

914 年，曹議金執掌敦煌歸義軍政權，從此開啟曹氏歸義軍時代。為穩固政權，對內，曹議金更加注重文治，以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來博取周邊民族的尊崇；對外，採取政治聯姻：東邊，與甘州回鶻和親，娶甘州回鶻聖天可汗的公主為妻；西邊，與佛教王國于闐結好，嫁大女兒給于闐王李聖天為皇后。同時，加強與中原王朝聯繫，使用中原正朔，利用昔日大唐帝國在各民族心目中的聲威，在西北民族中樹立起自己的正統地位。曹議金勵精圖治，讓敦煌迎來了晚唐以來文化最為繁盛的時代，它的漢化佛教更直接影響了西州回鶻和于闐王國。

于闐素有「佛教王國」之稱。于闐王李聖天與曹氏生下的從德太子，在童年時期（約 935 年）被帶到敦煌，從此長住於此，成了一個于闐語和漢語兼通的佛學大師。966 年，從德太子入宋朝貢。第二年父王晏駕後，從德太子繼位為于闐國王。就在他回國即位時，西邊的黑韓王朝已經在不停地攻打于闐。970 年，從德寫信給遠在敦煌的舅舅——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請求發兵援助抵禦黑韓王朝。

戰爭是殘酷的，並沒有因為佛教倡導和平、不要殺戮而停止。黑韓王朝雖然

一時沒能攻下于闐國都，但一波又一波的進攻不曾停息。1006年，艱難抵禦近40年後，于闐國都失守，佛教遭到毀滅性打擊：佛寺被燒，佛經被毀，僧人遭到屠戮……

于闐淪陷後，大批難民逃到敦煌。藏經洞裡有一批極其完整的于闐文佛典，或許正是由逃難的于闐僧人帶來。當這批于闐僧人來到莫高窟，帶來伊斯蘭東進的消息時，莫高窟眾僧憂心忡忡。

怎麼辦？三界寺的僧人沒有猶豫。為避免遭受類似于闐佛教那種毀滅性的打擊，他們決定將經卷、佛畫封存洞中。封上藏經洞門後，三界寺的僧人又將位於現在編號為16窟的甬道——藏經洞的外牆畫上壁畫，同時將整個16窟粉刷一新，確保萬無一失。

然而，黑韓王朝並沒有打過來。

躲過了西邊的打擊，東邊的軍隊又在向敦煌進發。這次敦煌沒有被幸運女神眷顧，20年後被西夏征服。隨着當事人離世，藏經洞於是不為人知，被人們長期遺忘。

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和原因，並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上面的引述，是敦煌學家、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提出的一種新的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因為沒有直接證據，學界對藏經洞為何封閉、甚麼時候封閉，有着各種各樣的分析和推斷。

一種通常的說法是，躲避西夏侵襲。藏經洞裡有確切紀年的最晚一份文書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正處在西夏佔領敦煌的前夜。同時，洞窟中沒有發現西夏文書。一些專家因此推定，藏經洞封閉應該是西夏佔領敦煌前，莫高窟僧人為躲避西夏攻擊，悄悄將經卷封存起來，把洞口堵上，並畫上壁畫掩人耳目，之後逃避戰亂的僧人再也沒有回來。

這種「避難說」的最早提出者是伯希和。從藏經洞遺書年代中最晚的1002年，向上倒推100年，幾乎每年都有有紀年的文書留存。但是，西夏佔領敦煌是1036年，中間出現了長達34年的空白無法解釋。

另一種流行的說法注意到，藏經洞內多殘卷，很多是當時清點寺院藏書後廢棄不用的文書。同時，藏經洞內有大量的捲軸式經卷，它們在10世紀末折葉式經卷廣為流行後已經失去實用價值，但是當時佛教一般不准毀滅經典，於是便被封存在了洞內。也就是說，敦煌遺書是些廢棄不用的東西。

這種「廢棄說」的最早提出者是斯坦因，但同樣不能說服人們。藏經洞內固

然有很多殘卷，但也有從 5 世紀初葉以來的各種首尾完整的佛教典籍，一些經卷長達 10 米以上，同時洞內藏有許多精美的佛畫。況且，殘卷多也不能說明就是廢棄不用的。地處西北的敦煌，在那紙張值錢的年代和紙張稀缺的地方，片紙也彌足珍貴。

至於封閉的時間，除了宋初避西夏之亂說之外，還有學者說是在西夏佔據敦煌以後的某個時期。更有甚者，據說流散到國外的敦煌遺書中，還發現了一件晚至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這一信息曾使人們驚訝不已！因為封閉藏經洞的時間，無疑是在洞裡有紀年文獻的年代之後。但研究者很快發現，這份文書並不出自藏經洞，而是在藏經洞發現後從洞外放入的。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時，一定也納悶過：究竟是誰把它封閉起來的？甚麼時候封閉的？為甚麼封閉？當然他是想不出所以然來的。後來便是他將藏經洞文書不斷地往外拿，再後來就是一連串的你搶我奪。現場早已破壞，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和原因，於是便越發撲朔迷離起來。

藏經洞發現的其他傳說

我們講述的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來自王道士的墓誌銘。實際上，藏經洞的發現，也還有其他一些說法。

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是這樣的：王道士來到莫高窟後，受他雇傭的秀才楊某在 16 窟甬道背壁而坐，抄寫經文。抄經閒暇之時，常常用芨芨草作引火點吸旱煙，點着後的芨芨草則插在身後牆壁的裂縫之中。有一次，楊某點煙後的餘草較長。當他將其插入牆壁的裂縫裡時，竟然深入不止。用手拍打牆壁，像是空的。於是，楊某將此事告訴了王道士。當夜，兩人持燈破壁，只見牆壁中有一個由磚塊填充的小門。當他們移去磚塊後，發現竟然是一間藏滿古代寫經的密室。

或許是芨芨草這種植物的不易燃燒，有人將引火點吸旱煙的芨芨草換成了廟裡的佛香。說抄經的楊某每吸旱煙時，將一根佛香插在身後牆壁的小縫裡，以作為引火的工具。有一天，無意中將佛香插得很深。一支香全插完了，也沒有到底。後來發現這牆後面是空的，於是他就告訴了王道士，之後密室就被發現了。

這個傳奇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有一天，楊某在抄經之暇，吸旱煙消閒，當楊某將旱煙煙桿的鐵頭向窟壁磕除煙灰時，聽到牆壁發出咚咚的回聲。楊某驚訝不已，於是將此事告訴了王道士。待到夜深人靜之時，兩人打開牆壁，找到了洞口。

事實上，與王道士墓誌銘記載相仿，認為是清理流沙發現藏經洞的證據還有多處。在一份準備上呈慈禧太后的奏件中，王道士這樣介紹藏經洞的發現：「至（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同工人用鋤挖之，掀出佛洞一所。」

雖然是擬上報朝廷的奏件，但天炮響震而山裂一縫云云，顯然是在故弄玄虛，也許只不過是為了表達發現藏經洞的天意，以引起朝廷的重視。

斯坦因在敘述其騙取藏經洞寶藏的經過時，這樣寫道：王道士發現「甬道右邊繪有壁畫的牆上的小裂縫。在塗泥下面是洞窟而不是堅固的礫岩，就在那裡鑿成了洞窟和入口，拓寬這個空隙時，他發現了秘寶」。這應該是王道士告訴他的。

第16號窟處在崖面的最下一排，由於常年無人照顧，流沙被清除後，窟壁失去了多年以來的支撐力量，從而裂開一道縫隙。王道士循縫破壁，塵封了近千年的文化寶藏得以開啟，沉睡了近千年的曠世珍寶得以呼吸20世紀的新鮮空氣。

是王道士清除流沙時發現了藏經洞？還是楊某吸旱煙時發現意外情況之後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對於如此重大的發現，即使再推測出一種說法，看來人們也還是樂於傳播的。

總之，王道士從此與藏經洞結下了不清不白的緣分。

中國：與國寶失之交臂

王道士被自己的發現驚呆了。為了弄清楚是些甚麼東西，他倒騰了藏經洞裡的全部藏品。雖然沒有發現更值錢的東西，雖然不知道這些文物的文化價值，但他隱約感覺到了這些東西應該是有用的。

王道士請來了敦煌本地紳耆，大家面對這許多古物同樣驚訝萬分，不知所措。最後大家的意見似乎是統一了，認為這是先人佛祖功德物品，應該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讓它們流失在外，那簡直是造孽，是罪過，是對不起先人的，所以他們一致認為還是留在洞窟內的好。

一些年過去以後，藏經洞的藏品已經是人人皆知的寶物了，全世界都在為爭得一點藏品而費盡心思。回想起敦煌本地的父老，我們是否應保留一點敬意呢？他們確實不了解這些文物的真正價值，但他們仍然保存着一種虔誠，保存着對於先人虔誠的尊敬。他們沒有起碼的商業頭腦，沒有想着利用這些古物去換取金錢。他們遵循心中的戒律，他們恐懼天罰。

王道士在各地流浪過，比當地父老見的世面要多，當地父老的意見沒能讓他

感到滿意。王道士沒有灰心，他要繼續為這批東西求得答案。

王道士沒有停止他的行動，正在四處化緣、振興道教事業的他需要一筆捐助，也需要良好的社會關係，他要設法讓新發現的藏經洞經卷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那年，敦煌縣令是嚴澤，一年後由湖南沅江人氏鄔緒棟接任。敦煌的地方官員和士紳有許多人接受過王道士的經卷贈品，有的施主也得到過。兩位縣令是否擁有藏經洞藏品，沒有留下文字記載，所以也就不得而知。

1902年3月，汪宗翰（有的文獻中稱「汪宗瀚」）出任敦煌縣令。汪縣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和絹畫。在汪宗翰任上，藏經洞文書和絹畫流出的數量開始增多，流傳的範圍開始變廣。

汪宗翰，湖北通山人，與王道士算是「老鄉」。汪不愧為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當他見到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後，感到這些經卷非同一般。有記載說，汪宗翰曾經帶人來莫高窟翻檢一過，共有佛經兩萬多件。不過，當時認為這些佛經價值不大，有的人順便帶回了一兩卷，汪縣令吩咐王道士「善為保存」。



葉昌熾（1849–1917）

1903年冬天，汪宗翰將藏經洞的消息寫信告訴了身在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同時給他寄送了藏經洞所出《大中碑》拓片和藏經洞文書。葉昌熾是在汪宗翰出任敦煌縣令3個月後，以翰林院編修身份當上甘肅學政的。1849年出生於江蘇吳縣（今蘇州）的葉昌熾，晚年慕莊子所謂「緣督以為經」的中和自然之道，自號緣督廬主人，40歲時考中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葉昌熾生當同治、光緒年間，地處吳門文人薈萃之地，所交師友潘祖蔭、吳大澂、馮桂芬、王頌蔚、繆荃孫、沈曾植等，均為一代鴻儒。葉氏本人則於金石碑版之學尤為潛心，當時他的石刻學巨著《語石》正在校訂過程中。

清代學政是統轄一省教育的最高長官，每年都得巡迴進行歲考，以選拔或罷黜參加考試的生員。剛一接任甘肅學政，葉昌熾便巡迴跋涉於各州之間，同時搜訪各地碑拓。敦煌屬安

西州，此時已是一個荒僻小縣，考生不過三五人而已。葉昌熾僅僅到了酒泉。不過，他與當時的敦煌縣令汪宗翰就藏經洞文書有過通信，與時任敦煌縣儒學訓導的王宗海也有直接交往。這些信息在葉昌熾的日記中都有反映，他的《綠督廬日記》從 1870 年一直記到了 1917 年 9 月 15 日生日的那一天（去世前七天），前後 48 年少有間斷。就是在這部將近 200 萬字的日記裡，留下了有關藏經洞文書的最早記錄。

葉昌熾通過汪宗翰，不僅獲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銘拓片，還收到了藏經洞內出土的佛畫、經卷和所藏石碑（《洪誓碑》）拓本。在 1903 年 12 月 30 日的日記中，葉昌熾記錄收到了汪宗翰寄來的藏經洞所出《大中碑》拓片、繪有水陸道場圖的絹畫一幅，以及內容為大般涅槃經的寫經 4 卷。

1904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6 日，葉昌熾在肅州（酒泉）主持考試，又收到了來自藏經洞的藏品，然而他並沒有去現場的意願。他在 1904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記中記載，敦煌縣儒學訓導王宗海特意給他帶來了兩卷藏經洞所出唐代寫經和一幀畫像。日記寫道：「夜，敦煌王廣文（即王宗海）來，云莫高窟開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僅一丸泥，峴然扁鑄自啟，豈非顯晦有時哉。」王宗海告訴他，藏經洞不過是個很小的洞子，並沒有太多的藏品，但它自行打開，是有些神奇的，看來是天意吧。

葉昌熾本來是有機會去現場看個究竟的，但他一直坐在書齋裡討論藏經洞藏品，始終沒有踏上敦煌一步。

後來，據說藏經洞的事情上報到省裡了，陝甘總督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熱情。雖然有過命令將經卷運送蘭州，但預估得要 7 輛大車運送，費用實在太多，運到後面對一堆發黃的舊紙，保管起來更是麻煩，因此發文敦煌縣政府：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1904 年 5 月 15 日，汪宗翰接到上級命令後，曾對藏經洞遺書檢點封存。但是，不論是汪宗翰，還是王道士，都沒有認真執行，只是在藏經洞上加了一道簡陋的木門，上了一把鎖，鑰匙放在了王道士道袍的口袋裡。在汪宗翰送給葉昌熾的絹畫上，我們看到了汪宗翰這樣的題字：「光緒卅年四月朔（1904 年 5 月 15 日），奉檄檢點經卷畫像畢。」被封存的物品到了執行封存人的手上，封存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

藏經洞的真正主人還是王道士。藏經洞的物品大多數都是經過王道士之手流傳於世的，經卷和絹畫繼續成為討好官場、滿足文人雅好的饋贈之物。在當時人

們的記錄中，關於藏經洞的具體情況極其混亂，比如藏經洞的大小、藏品的多少等等。很顯然，在王道士向當局報告的過程中，官員們接過藏品時的興奮表情告訴了他，這些藏品是珍貴的。於是，王道士把真情隱瞞了起來，只是透露部分實情。而所有的官員，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

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都是社會底層的人首開其端的。晉朝的汲冢古墓，是盜墓者引發的；殷墟甲骨的發現，是農民耕地的副產品；秦始皇兵马俑是農民打井時發現的。但是，緊接着，這些發現都有學者繼續整理與研究。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藏品則不同，由於當時官員的麻木和學者的隨意，使得王道士與這些藏品長年相伴。

1905年11月，因貪污而遭到革職、充軍新疆伊犁的南海縣知事裴景福到達蘭州。這位晚清知名的收藏家接觸到了藏經洞藏品，葉昌熾不失時機地拿出了自己收藏的藏經洞藏品請其鑑賞。葉昌熾在1906年元旦的日記中，說裴景福對藏經洞所出唐代寫經讚譽有加，對3幅佛畫則不以為然。兩人「長談至暮，始別」。裴景福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則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對藏經洞封閉的原因和時間做了推測，認為藏經洞可能是在宋初時封閉。

裴景福離開蘭州繼續西行，路過安西，前往新疆。然而，他並沒有稍微拐一下彎前往藏經洞看一看究竟。身為甘肅省教育領域最高官員的葉昌熾，沒有對新發現的藏經洞藏品做出更好的保護，只是滿足於收受像敦煌縣令汪宗翰一類下級官員奉送的收藏品。

在藏經洞藏品被大量運往國外、中國學者得知實情以後，沒有一個人不是痛心疾首的。埋怨當地政府不負責任的有之，指責外國人掠走文物的有之。在所有的激憤言辭中，沒有人比葉昌熾更悔恨交加的了，因為連他自己也承認，他本來是最有機會的。

如果說，王道士的文化教養不足以讓他了解敦煌藏品的真正價值，那麼像葉昌熾這樣的一流學者總該有相應的意識吧，但令人扼腕的是葉昌熾的腳步在敦煌幾百里之外停了下來，成為中國人在敦煌傷心史上最遺憾的一個鏡頭。

1906年，藏經洞藏品的命運依然有出現轉機的希望。這年夏天，接替汪宗翰出任敦煌知縣不久的黃萬春向清廷學部呈交《敦煌縣鄉土志》，報告了敦煌藏經洞文物的發現。遺憾的是，學部的官員並沒有人關注這一信息，更沒有人進一步跟進。

中央學部官員的忽視，依然不是藏經洞藏品流散海外的最後宿命。1906

年，署理甘涼道道台的廷棟參觀了莫高窟。在藏經洞文書發現之後，他應該是行政級別和文化水平都比較高的最早來到莫高窟的縣級以上官員。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莫高窟臨摹的張大千和謝稚柳都關注過藏經洞文書流散情況，謝稚柳在《敦煌藝術敘錄》中說：「王道士頗機詐，思藉之以貿利，私載經卷一箱至酒泉，獻於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廷棟不省，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己下，無足重。王道士頗喪沮，棄之而去。」說的是王道士帶上一箱藏經洞文書，興沖沖地奔向了數百里之外的酒泉，獻給當地最大的官員安肅道道台廷棟。然而，廷棟的反應出乎王道士意料。精於書法的廷棟看了王道士帶來的經卷，覺得書法水平一般，還不如自己寫的好。他對這些東西沒甚麼興趣，對此王道士沮喪不已。

張大千和謝稚柳的說法當然不是事實。廷棟從王道士手中獲取過大量敦煌寫本，現在我們知道他擁有過的敦煌寫本總數接近 1000 卷，國內各級獲取過敦煌寫本的官員或其他人都沒有他收藏的多。王道士將莫高窟中的一些殘破佛像堆在一起建成功德塔——千相塔，在接近完工時，他請廷棟撰文並書寫了《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1910 年 11 月 22 日刻石立碑。

1906 年，廷棟從東北錦州府知府轉任西北，署理甘涼道道台（1908 年轉任安肅道道台）。這一年，廷棟來到敦煌，參觀了莫高窟，他在《千佛洞懷古》的詩中寫道：「玉門關外訪禪林，樹老山空雲水深。古洞莊嚴多歲月，鳴沙有韻響雷音。畫留北魏傳神筆，經譯初唐入道心。卅六年華重到此，蓮台舊跡昔登臨。」

1906 年藏經洞寫經在甘肅省內外早已傳開，廷棟這次在斯坦因之前到訪莫高窟，又是看壁畫、又是論寫經，自己當然少不了在藏經洞寫經方面有收穫，至於整個敦煌寶藏的命運和保護之類，廷棟才不去想、不去管呢。

就這樣，藏經洞寶藏在各級官員和民眾的無知與漠視下，默默忍受着最後的孤獨。

在外國人進入藏經洞之前，中國有長達 7 年的時間可以妥善保護藏經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國與自己的國寶一次次地失之交臂，眼睜睜地看着一個個外國考察家，從四面八方湧來。

第2章 斯坦因的中國護照

志得意滿

很多大人物的成功是小人物造就的。斯坦因和王道士就有這樣一層關係。

1907年5月21日至6月13日，斯坦因在敦煌度過了他最難忘的24天。24箱稀世經卷和5箱精美佛畫的獲取，代價不過是區區4個馬蹄銀。一夜之間，斯坦因就達到了他的人生巔峰。

斯坦因做夢也沒有想到英國女王親自接見和冊封。遙遠中國的一個佛教洞窟，帶給他的竟是如此耀眼的光芒。是衣衫破舊的王道士及其手中的寶物，把他送進了英國皇家富麗堂皇的覲見廳。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坦因喜不自勝地描述道：「一切全都那麼令人興奮，在皇家前廳等待接見時，受到尊貴同伴的接待，入目盡是華麗制服。」

斯坦因的大名不僅震動英倫三島，整個歐洲都在為他夜不能寐。當他重訪故里時，整個布達佩斯沸騰了。「午餐、宴會，還有晚餐應接不暇——第一次講座大獲成功，戲院擠滿了『紳士淑女』，門票十天前即已告罄。幻燈棒極了，音響效果奇佳，我站着講了1小時45分鐘，並不覺得太累。（聽眾）那種半含敬畏的神態令我感動，直到終了，會場中始終鴉雀無聲。……星期一又重做了一次報告，接着乘夜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晚上又在那裡做報告，接着又去慕尼黑。」50個小時之內連做了4場報告，斯坦因成為遠征凱旋的英雄，鮮花、笑臉和歡呼如同空氣一樣緊緊環繞着他，令他如癡如醉、亢奮不已。

只要看一看斯坦因由此獲取的頭銜，就知道他在榮譽之路上走了多遠：英王親自接見，獲授印度帝國榮譽公民（C.I.E.），兩年後受封印度帝國高級爵士（K.C.I.E.）；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授予「創建者獎章」金質獎章（國際地理學最高獎）；法國、比利時、匈牙利等國同樣給了他各種不同的榮譽。

敦煌獲寶的斯坦因於1909年1月21日回到倫敦，第二天便接受了路透社記者的採訪，幾乎所有英國大報隔日都刊登了路透社的報導，斯坦因開始成為家喻戶曉的探險家。當月《倫敦新聞畫報》推出「15個當代偉大探險家」時，斯坦因名列榜首。

西方各界給予斯坦因的榮譽，都來自於他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功。

大英博物館展出斯坦因從中國帶來的經卷和絹畫，參觀者絡繹不絕。但是，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即這些文物獲得的過程在展出時沒有做介紹，甚至連斯坦因的肖像也沒有設置。沒有英雄形象，沒有英雄事跡，只有戰利品。是被忽略了嗎？不，是被小心地省略了。這些文物獲取的合法性似乎已經受到質疑，大英博物館要盡量避免喚起觀眾在這方面的聯想。

首次考察

1900年6月，當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時，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亞考察剛剛開始，已經從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出發。在藏經洞發現後第7天，他率領的考察隊進入了中國境內。

斯坦因，1862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當時正是奧匈帝國統治時期，斯坦因從小就會匈牙利語和德語。15歲時，學會了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英語。21歲時，獲得杜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因為主攻方向是東方學，所以又學了梵文和波斯文。之後，斯坦因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讀東方語言學和考古學，從事印度、波斯及中亞地區歷史研究。

1888年底，斯坦因前往英國殖民地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出任一所語言學校的校長，同時從事克什米爾古代文化和地理研究，以及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進行考古學和地理學考察。

當時的歐洲，中亞探險日趨增多。自從1889年英國中尉鮑爾從新疆獲得57頁樺皮梵文文書後，中亞古代語言資料就引起了歐洲的極大關注。1895—1896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展開地理考察的同時，挖掘古代遺址，獲得大量文物。1897年，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法國旅行家格林納德介紹在新疆和闐發現的佉盧文佛經《法句經》殘片，轟動了歐洲學術界。在此之前，中亞在歐洲主要以地理學考察為主，新的古老文物的發現，使歐洲學術界認識到，印歐語系的源流問題有可能從新疆的古



斯坦因 (1862–1943)

代遺址中找到答案。學術上的動因加上列強的明爭暗鬥，更多考察家蜂擁而來。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正式向英屬印度政府提出第一次中亞考察的申請，前往新疆和闐及其周邊進行考古調查。在報告書中，斯坦因寫道：「我還請求印度政府，通過英國外交部為我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取護照或許可證，使我能夠在中國新疆旅行。——我還想進一步指出，擬進行的考察能否取得成功，和闐地方當局的協助至關重要。因此，我希望印度政府能夠設法讓中國的中央政府或（新疆）省政府給和闐知州下達命令，使我得到以下許可：1. 准許我測繪或探尋和闐境內所有的古代遺址；2. 准許我對這些遺址進行發掘，並准許我保留所發掘的文物；3. 准許我在有人出售文物時購買它們。」

斯坦因同時寫道：「從我的計劃初步形成以來，俄羅斯帝國科學院已經宣佈，他們準備派出三位學者考察吐魯番，那裡也曾發現過古代文書。另外我還得知，斯文·赫定博士的考察也很可能重新開始。」

英國古文字學家霍恩雷在一封為斯坦因幫忙而寫給英屬印度政府的信中說：「我敢肯定，和闐和中國新疆南部是英國考察的適當範圍。用現代術語來說，它按理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而且我們也不該讓外人奪去本應屬於我們的榮譽。」

在斯坦因和他的支持者心中，顯然存在着國際競爭的動機，但中國的主權和中國人的感情又顯然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之內。當他們把競爭對手稱為「外人」的時候，似乎並沒有想過，在中國他自己毫無疑問也屬於外人。

斯坦因的考察計劃很快獲得印度政府批准，並通過英國外交部要求英國駐北京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斯坦因的護照申請。

在中國境內發掘和購買文物為清廷所不許，作為公使的竇納樂自然是清楚的。因此，在替斯坦因申請護照時，他並沒有按斯坦因的要求向清政府提出發掘或購買文物之事。

護照辦好後，竇納樂向英屬印度政府解釋道：「1898年9月10日司代諾（斯坦因的護照用名）博士致旁遮普省政府函第十二段中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在向總理衙門提出的護照申請中，如果將這些特殊要求提出是不明智的。司代諾博士在從事他所提到的測量工作時，也許將不會遇到甚麼困難。至於發掘和文物購買，據認為，任何提及此類事情的話都只可能妨礙他達到目的，而絲毫無助於實現目標。」

清政府總理衙門為斯坦因頒發的護照如下：

護照

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給發護照事。

准英國竇大臣函稱「現有本國士人司代諾，攜帶從人數名，擬由印度前往新疆和闐一帶遊歷，請轉發護照」等因，茲本衙門繕就護照一紙，由順天府蓋印發交收執。除咨行該省查照外，仰沿途地方官，於英人司代諾遊歷經過呈驗護照時，立即放行，照約認真妥為保護，毋得留難阻滯。切切，須至護照者。

右給英國士人司代諾收執。

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九日。

斯坦因正是帶着這份護照，開始了他的第一次中亞考察。當 1900 年 7 月 2 日晚霞滿天時，斯坦因收到專差送來的一封信和一批路透社的最新電訊。電訊帶來了北京爆發戰爭的消息。斯坦因在 5 天後給其老友艾倫的信中寫道：「北京的不快消息，看來不可能傳到這個邊遠的省份，這裡與中原聯繫太困難了。」日後斯坦因在大英博物館裡寫《沙埋和闐廢墟記》時也說：「使人驚奇的是，在這偏遠的中華帝國邊遠的西陲，能夠讀到一星期前發生在其首都引起了強烈震動的事件。好在這些動亂的消息，可能要過幾個月才會傳到喀什邊民耳中。」

斯坦因的判斷是正確的，當時中國國內的信息傳播緩慢，不僅北京的消息不能很快傳到新疆，就連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也沒有傳到新疆。

1901 年 5 月 12 日，斯坦因返回喀什，結束了考察行程。

斯坦因在和闐地區的考察和挖掘收穫巨大：在約特干第一次大規模挖掘，獲得文物近百件；挖掘丹丹烏里克遺址，獲得珍貴文物 150 件；在尼雅河故道，挖到文物 600 多件；在安得悅遺址，挖得文物百餘件；在拉瓦克罕塔波，收穫更是超出想像。

考察期間，斯坦因得到了和闐直隸州知州潘震等地方官員的鼎力相助，潘震也曾一再問斯坦因：「為甚麼所有這些古物都要搬運到遙遠的西方？」

面對「潘震之問」，斯坦因始終無語應對。不過，潘震也就僅此一問而已。斯坦因依然隨心所欲，將所獲文物捆載而去。

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結束，取道俄國返回歐洲。申請俄國簽證時，引起了斯坦因的國籍問題。俄國原以為斯坦因是英國籍，結果發現他在 1889 年已申請放棄匈牙利籍，還沒有申請入英國籍，所以這時他是無國籍。斯坦因後來解釋

道：由於他已經在印度政府任職，很自然地就自視為大英帝國臣民，所以忽略了辦理入籍的申請。也就是說，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為還不是英國籍的斯坦因申請護照，中國政府由此批准了一個無國籍的人在新疆遊歷。

中國政府對斯坦因的國籍不清不楚，但對斯坦因護照的內容則是明確的，批准的是遊歷護照，而不是發掘古代遺址、收購和帶走文物，斯坦因的行為明顯超出了護照允許的範圍。中國的地方官員顯然是昏頭昏腦的，但自始至終英國方面包括斯坦因在內都使用了欺騙手法，大量文物出境當然更是非法。

事實上，斯坦因第一次考察使用欺騙手段並取得成功，當時的中國政府一無所知。初試牛刀即大見成效，因此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故伎重演，護照上的文章越做越大。

耐人尋味的護照

斯坦因中國之行，首戰告捷，而且震撼了歐美學界。

1902年秋天，第13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在漢堡舉行，斯坦因報告了他在和闐的考察經過。他的報告引起參會者強烈反響，加速了「中亞和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俗學考察國際協會」的產生，中央委員會設在聖彼得堡，英國等歐洲12國和美國分別設立委員會。

新一輪對中國西北考察的高潮開始了，新一波中國文物外流的高峰期到來了。

斯坦因在向印度政府稅務官威爾遜尋求支持的一封信中寫道：「在我的旅行取得成功的極大影響下，德國政府現已派遣格倫威德爾教授前往吐魯番。我還得知他們已為該地區的發掘新撥款3500鎊。俄國政府儘管面臨困境（俄日戰爭），但也正在籌備由著名印度學家奧登堡教授率領的考察隊對庫車進行考古探險。」

也就是在漢堡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斯坦因從他的同鄉、匈牙利地質學家洛克齊那裡聽到了敦煌莫高窟精美壁畫和雕塑的介紹。1879年，洛克齊作為「塞欽伊考察隊」的一員曾到達敦煌。他對莫高窟印象如此深刻，20多年後依然無法忘懷，因此建議斯坦因再次開展中亞考察時從新疆向東延至敦煌。

會後，躊躇滿志的斯坦因開始計劃在新疆、甘肅等地進行規模更大的第二次中亞考察。在斯坦因入籍英國那年（1904）的9月14日，他向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前往和闐、羅布淖爾（樓蘭）、沙州（敦煌）考察的申請書。

根據第一次考察經驗，他特意在申請經費項目中，單列了一項用於「珍貴禮品」的開支，也就是專門用於給當地中國官員行賄送禮的費用。同時，在申請書中特別強調：「如果我的建議獲得了印度政府批准，我請求及時採取措施，從中國政府那裡為我獲得必要的護照，能夠讓我在中國新疆和甘肅遊歷，必要的話還要再往東行。在護照上明確提一下我的官職顯然是很有用的，因此我希望能盡力提請大英國王陛下駐北京公使館將注意力放到這一要點上來。」

1905年春，斯坦因的申請獲得了英屬印度政府和英國政府印度事務部的批准。繼而英國駐北京公使薩道義着手為斯坦因從清政府外務部申辦中國護照。斯坦因的「特別強調」，着實讓薩道義動了一番腦筋。他終於不負所託，充分滿足了斯坦因的要求。最後，一個「總理教育大臣」憑空產生了。

1905年9月10日（陰曆八月十二日），清政府外務部繕寫並頒發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的護照：

護照

外務部為發給護照事。

准大英國駐京大臣薩（道義）函稱「准印度政府咨稱：本國總理教育大臣司代諾請照遊歷新疆在案，現擬明春復派由印度攜帶從人前往新疆、甘肅、陝西等省考查古跡，請繕發護照」等因，本部為此繕就護照一紙，並蓋印標朱訖，送交大英國薩大臣轉給收執。所有經過地方官，於司代諾持照到境時，立即查驗放行，照約妥為保護，毋得留難阻滯，致干查究，切切。須至護照者。

右給大英國總理教育大臣司代諾收執。

光緒三十一年（1905）捌月拾貳日。

這真是一張耐人尋味的護照。

英國方面精心又隨意地往斯坦因頭上安了個「印度總理教育大臣」，中國政府方面稀裡糊塗就承認了，而且還給斯坦因提升了級別，變成了「大英國總理教育大臣」。第一次考察時的「英國士人司代諾」搖身一變，成為了「大英國總理教育大臣司代諾」。

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察前擔任的「（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斯坦教

育監察主任兼考古調查員」，是他一生中擔任過的最高職務，而且在考察之前已經卸任。

在斯坦因一方，憑空出現的這個總理教育大臣只是為了考察方便，他們自己是並不當真的。但在中國方面，由於斯坦因的官職，他成了英國政府的正式代表，這樣，中國官方無疑更加重視、更加關照，因為這已不是民間身份的遊歷和考察，而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正式往來了。因此，護照上要求西北各地方官員「照約妥為保護，毋得留難阻滯，致干查究」。

中國官員的愚昧無知固然是可笑的，但是行騙的一方確是精心設計。同時，護照明確斯坦因來華「考古古跡」，並未准許他發掘和購買文物，將它們運出中國。然而，英國方面早已謀定而動。

蔣師爺隨行

1906年4月27日，在大英博物館和英屬印度政府聯合資助、同時已經劃定發掘文物分成的情形下，斯坦因從白沙瓦出發，踏上了前往敦煌的旅程。此刻，正是甘肅學政葉昌熾離開蘭州東歸之時。

斯坦因做好了「搜集地下寶藏」的一切準備，包括自我武裝。出發之前，斯坦因向軍方要了兩支卡賓槍、三支左輪手槍和一些彈藥。「我要這些東西供我和我的印度助手使用。我要去離普通商路或中國駐軍很遠的地方考察，一些適度的防衛措施是合乎邏輯的，特別是考慮到我的工作必定會被人當作是搜集地下寶藏。」

在疏勒，由英國駐喀什領事館總領事馬繼業協助，物色到了在甘肅和新疆多地為各種軍政官員擔任師爺（幕僚，無官職的佐理人員）20多年的蔣孝琬作為秘書兼翻譯。

蔣師爺不會英語、斯坦因不會漢語，雙方可以用簡單的維吾爾語交流。一路上，斯坦因向蔣師爺討教了一些官場應對之術，並掌握了沿途一些官員的履歷、興趣愛好乃至貪污受賄等細節。

斯坦因第二次中國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攫取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雖然這一計劃沒有完全實現，但最後的結局更為美妙——他意外獲取到了藏經洞珍寶。

對於如何從王道士手中獲取到藏經洞珍寶，斯坦因在日記、考察旅行記《沙埋契丹廢墟記》和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中，曾不厭其煩地作了敘述。對他來說，獲取到藏經洞珍寶，是人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